

士伯,春秋时晋国讲大义的贤大夫

□ 张旭明

“晋侯赏桓子(荀林父)狄臣千室(狄人的奴隶一千家),亦赏士伯以瓜衍之县。”(杨伯峻注:“瓜衍之县,《彙纂》谓即今山西省孝义县北十里之瓜城”)孝义人经常引用《左传·宣公十五年》所记载的这一史实,以说明孝义建县之早。而对士伯其人行事、历史功绩鲜见文字介绍。其实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中有关士伯的记载不少,从中我们可以看出,士伯是春秋时期晋国一位很讲大义的贤大夫。

士伯,名渥浊,又称士贞子、士贞伯,官至晋悼公(公元前573—公元前558在位)太傅。为春秋后期专权晋国国政的六卿之一的范氏先祖。

现将《左传》及《国语》等典籍中有关士伯的记载论次如下。

一、仗义执言,

谏阻晋景公处死晋三军主帅荀林父,有大功于晋

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载:公元前597年,楚国为报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(城濮,今山东鄄城西南。城濮之战,即晋文公时晋、楚两国进行的争夺中原霸权的首次大战。“退避三舍”的典故,就发生在这次战争中)的军败之辱,与晋国在邲地(今郑州北)展开争霸中原的会战,即晋楚邲之战。晋军战败,当时晋军的主帅是荀林父(桓子)。“晋师归,桓子请死,晋侯欲许之。”士伯以35年前晋楚城濮之战晋军大胜后,晋文公却“有喜而忧”的事例,仗义执言,又循循善诱地谏阻晋景公:“不可,城濮之役,晋师三日谷,文公犹有忧色。左右曰:‘有喜而忧,如有忧而喜乎?’公曰:‘得臣(楚国的相国,此人很有谋略,为楚国名臣)犹在,忧未歇也。困兽犹斗,况国相乎?’及楚杀子玉(得臣,字子玉),公喜而后可知也(文公喜形于色)。曰:‘莫余毒也已!’(再也没有谁能害我了)是晋再克而楚再败也。楚是以再世不竞。今,天或者大警晋也,而又杀林父以重楚胜,其无乃久不竞乎?林父之事君也,进思尽忠,退

思补过,社稷之卫也,若之何杀之?夫其败也,如日月之食焉,何损于明?”

这一段士伯谏阻晋景公欲处死荀林父的说辞,翻译成白话文是:“不行。城濮之战,晋军战胜后吃了楚军三天的军粮,晋文公仍面带忧虑。他手下的人说:‘有了喜事你却忧愁,难道有了愁事才高兴吗?’文公说:‘楚相得臣还在,晋国的忧愁远没有结束。被困的野兽还要拼死搏斗,何况是一国之相呢?’等到楚国杀了子玉,文公才喜形于色,说:‘再没有谁能害我了!’这样就等于晋国第二次战胜,而楚国再次失败。因此楚国成王、穆王两代国势不再强盛。如今上天或许是要严厉警戒晋国了,如果又杀了荀林父使楚国取得第二次胜利,晋国不是也要一蹶不振了吗?荀林父侍奉国君,任职时想着如何尽忠,退位时想着如何补过,真是捍卫国家的重臣,为什么要杀死他呢?至于他的这次失败,就如同日食和月食一样,对日月的光明又有什么损害呢?”

由于士伯的谏阻,最后晋景公

不仅没有处死荀林父,还官复原职,“晋侯使复其位。”

三年后,鲁宣公十五年,即公元前594年,“晋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(今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)。”“灭潞(潞国,今长治一带)。”“酆舒(春秋时赤狄潞氏的国相)奔卫,卫人归诸晋,晋人杀之。”为此,晋景公“赏桓子(荀林父)狄臣千室,亦赏士伯以瓜衍之县”且不无感慨地对士伯说:“吾获狄土,子之功也。微子,吾丧伯氏(荀林父,又称荀伯,故这里称伯氏)矣。”言下之意是,如果不是你谏阻我处死荀林父,我就失去了荀林父这位能征善战,有谋有略的三军主帅了,也就不能获得狄土了。(《左传·宣公十五年》)。



二、见微知著能鉴人,预知郑悼公“宜不能久”

《左传·成公六年》载:鲁成公六年,即公元前585年春季,郑悼公为讲和一事前往晋国拜谢,公子偃做相礼,“授玉于东楹之东”,即,悼公在东楹东面授玉于晋景公。士伯见到这一情景,有所感想,说:“郑伯其死乎!自弃也已。视流而行速,不安其位,宜不能久。”意思是,郑悼公恐怕要死了吧!是他自

己不尊重自己。他目光游移心神不安,走路轻佻不稳重,不能处在他应当在的位置上,应该不会长久了。

当时的情况是,晋楚争霸,郑国处在晋楚两大国之间,左右摇摆,谁也得罪不得。郑悼公又生来软弱自卑,在大国国君面前失了方寸。所谓“授玉于东楹之东”,即,古代宾主相见举行授玉仪式,如果双方地位相当,就在堂上两根立柱(楹)中间的位置进行;如果宾客地位低,就在堂中靠近东边立柱(东楹)的位置进行。晋景公和郑悼公

都是诸侯,本来地位相等,即使认为晋侯是盟主,起码也应该在堂中靠近东楹的西面进行。郑悼公却在东楹以东授玉,实在是过分自卑。

几个月后,不幸被士伯言中:“六月,郑悼公卒”(《左传·成公六年》)。当时楚国因郑国疏远楚国而靠近晋国,用现在的外交辞令就是选边站,楚国出兵讨伐郑国。《左传》未记载郑悼公是如何死的,可能不是战死,就是吓死了。总之郑悼公在位仅二年就一命呜呼了。

三、士伯在当世就获得很高赞誉,在后世也很有影响

《左传》全书不到20万字,记载春秋254年的历史事件与众多历史人物,惜字如金,而关于士伯的文字就用了数百字,可见士伯在《左传》中的分量有多重。

鲁宣公十五年晋景公重赏士伯后,晋大夫羊舌肸(说(悦)是赏也),对给予士伯的赏赐感到很高兴,并大发感慨:“《周书》所谓‘庸庸祗祗’(任用可任用之人,敬重可敬重之人)者,谓此物也夫!士伯庸中行伯(荀林父),君信之,亦庸士伯,此之谓明德矣。文王所以造周,不是过也。故《诗》曰‘陈锡哉(载,创立)周,能施也。率是道也,其何不济?’”(《左传宣公十五年》)

这一段羊舌肸的慷慨陈词,翻译成白话文是:“《周书》所谓‘任用可用之人,敬重可敬之人’的话,说的就是这一类事情啊!士伯认为荀林父可用,国君就信任荀林父,也任用士伯,这就叫做明德。周文王用来创建周朝的办法,也不会超过这些了。所以《诗经》上说:‘布施恩泽赏赐天下,从而创立了周朝。’说的就是能施恩德。按照这个道理去做,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呢?”

这里羊舌肸赞誉士伯仗义纳谏,晋景公从谏如流,且给予重赏的明智之举:“文王所以造周,不是过也。”其评价之高,不可复加了。

晋悼公是晋文公之后又一位有雄才大略的杰出政治家,公元前573年即位,欲大刀阔斧修治晋国内政,即重用士伯为太子太傅。《左传·成公十八年》载:晋悼公“使士渥浊为太傅,使修范武子之法。”(范武子,晋文公争霸前后,晋国重臣、元老。杨伯峻注:“范武子即士会,以中军帅兼太傅【辅导太子的官】”)《国语·悼公即位》又载:“君知士贞子之志博闻而宣惠于教也,使为太傅。”师者,循也;志者,典籍也;宣者,遍也。“师志博闻而宣惠于教”,即,“遵循书志典籍,博见多闻,广泛地以仁爱之心从事教化”。一个很有作为的国君如此评价一个臣子,是很难得的了。

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中士伯,又称士贞子、士贞伯。贞子、贞伯之“贞”是谥号,在中国文化中“贞”字涵有许多正面褒义。贞者正也;坚贞、忠贞、贞操;《周易》“元亨利贞”是最佳状态。《溢法》贞:“清白守节曰贞,大宪克就曰贞,忧国忘死曰贞……”可见,士伯是当世公认的正直、忠贞讲大义的贤大夫。

士伯在后世也很有影响。士伯纳谏时评价荀林父事君所言“进时尽忠,退时补过”八字,孔子作《孝经》时原句引用(杨伯峻注:“‘进思’两句,今《孝经》事君章亦有之,乃作《孝经》者用《左传》,非此引《孝经》”)。此八字,司马迁在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中评价晏子事君时亦有引用:“至其谏说,犯君之颜,此所谓‘进思尽忠,退思补过’者哉!”西汉刘向编撰的旨在记述诸子言行,体现儒家哲学思想、政治理念以及伦理观念的《说苑》一书收录了士伯谏阻晋景公处死荀林父的史实。

“瓜衍之赏”,作为千古美谈,成为中华成语,亦成为重赏的代名词。西晋陆机写的连珠体骈文《演连珠》之十二中有“是以柳庄出殡(在内室殡殓,不使居正堂),非贪瓜衍之赏。”骈句。《南史·谢方明传》载,南朝高祖刘裕在未推翻东晋王朝登大位前,为豫章郡公时,谢方明被举荐为刘裕的中军主簿,“知无不为”。刘裕很是器重,曾对谢方明说:“愧未有瓜衍之赏,且当与卿共豫章国祿”。士伯谏阻晋景公处死荀林父时所引用晋文公所言“困兽犹斗”,亦成为中国人至今仍经常用到的成语。

自鲁宣公十五年,即公元前594年瓜衍县民成为士伯子民起,直至公元前490年,其曾孙范士吉射(士伯先人在晋国任士师,为司法官,随官为氏,故为士氏。又士伯为晋国大夫士会的侄子,士会封范地,又别氏为范氏。春秋时以氏为贵,称氏不称姓)败于赵简子奔齐止,历时百余年。“君子之德风,小人之德草,草上之风必偃”(《论语·阳货》)。士伯讲大义的国土之风必若“时雨化者”,潜移默化其子弟尊道行义。故,孝义人重义、仗义行事的传统,远可追溯到春秋中期受赏瓜衍之县的晋国贤大夫士伯。

当时,与士伯行事密切相关荀林父、士会等都是晋国春秋霸主前后,佐命立功、叱咤风云的重要历史人物,围绕士伯扩充开来,可挖掘、研究的史料很多。本文仅权作抛砖引玉,有待专家纠正之、深入之。

